

论瓦雷拉神经现象学的逻辑困境

李莉莉¹ 刘运全²

(1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7; 2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处,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神经现象学是瓦雷拉为了应对意识的“困难问题”所提出的一种研究设想,意在整合脑神经科学和现象学的研究资料。在主题上,神经现象学表现出对现象学的依赖,在方法上,其极力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事实上,神经现象学出现的根本动因在于,一方面源自近代以来平行论所驱动的整体心灵与脑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源于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盲目自负。方法论上的自负情结已经成为心理学甚至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障碍,只有重新恢复哲学的或现象学的方法论地位,重新增补心理学的哲学厚度,才能使心理的和意识的研究得到深入推进。

关键词 神经现象学;瓦雷拉;意识的“困难问题”;平行论

神经现象学是具身认知进路的提倡者之一瓦雷拉在 20 世纪末提出的关于意识经验的一种研究模式。它基于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一向忽视主体经验维度的做法,从而将第一人称的现象学研究主题与第三人称的神经科学研究路径相结合,试图整合双方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深入地反思这一做法,就会发现这一整合进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其最初提出的问题,即“跨越意识研究的鸿沟,以解决意识的‘困难问题’”(Varela, 1996)。其原因不仅在于意识“困难问题”本身所隐含的哲学困境,也在于神经现象学的方法论纠葛。

1 具身认知进路的错误归因

现代心理学的每一次危机都根源于那个在其成立之初的隐患,那个在心理学家中甚至在所有将心智作为研究主题的科学家中所信奉的方法论原则,即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意识的问题,以便突破传统哲学研究的瓶颈,并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心智科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在现代心理学家中“普遍流行着的一种严重错误的、并往往不得不因此而要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的偏见或理论态度,即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的)形式,还是在思维方式等方面,都要拒斥和否弃哲学,似乎他们(的理论)对哲学的远离同时也就意味着是对科学的接近”(高申春, 2000)。可以说,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每一次转折都是实验心理学在诞生之初的这个隐患的危机性写照,同时,每一次应对危机的革命也因为这个隐患的残留而无法在彻底的意义上真正消除危机。然而,这一决定心理学走向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

重视,包括具身认知进路的提出者们。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早期认知科学的计算—表征立场使认知科学的发展陷入僵局时,瓦雷拉等人将认知科学的问题归结为科学与经验的紧张关系,即认为早期认知科学“对日常的、活生生的情景中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几乎什么也没说”(Varela et al., 1991),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心智科学,一方面把活生生的人类经验和内在于人类经验的转化的可能性囊括其中,另一方面,一般的日常经验要从心智科学已取得的清楚明确的洞见和所做的分析中获益。从瓦雷拉等人的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看到了来自大众对作为心智科学的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不满,这种不满早在行为主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即人们日渐感觉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学科,除了在心理治疗中的技术应用外,几乎无法为现实生活的人们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经验指导。这种不满情绪并未因认知心理学或认知科学取代行为主义而消除。于是,瓦雷拉等人将认知科学的发展困境与这种不满联系起来,并认为二者的共同根源在于认知科学对人类经验的忽视。因此,如果能够将人类经验纳入认知科学的体系中,那么就能将认知科学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消除大众对心理科学的不满。瓦雷拉等人认为自己准确把握到了问题的关键,并努力塑造一种能够在科学与经验之间建立起循环关系的新的认知科学——具身认知进路。而实际上,此时瓦雷拉等人对认知科学问题的把握只是片面的。

由于心理学成为科学以来一直追求方法上的科学性,从而使其不得不将研究局限在便于采用实证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MZ069)

通讯作者:李莉莉,女,讲师,博士。Email:bluebird555@163.com

方法的主题上。或者更直接地说,这些便于采用实证方法的主题往往是来自第三人称的观察事实。在这方面,行为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行为主义之后的认知科学开始关注内部过程,但是,这种内部过程绝非是第一人称意义上的直接经验,而仍然是以便于观察或便于进行实证研究的对象为主,计算机程序隐喻就是这种方法论追求的最好立意,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们争相努力构建心理模型。这种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的适应使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在研究主题上偏废了来自第一人称主体的现象意识。对于瓦雷拉等人而言,只要在主题上恢复这一研究对象,就可以超越早期认知科学的障碍。但事实上,现代心理学在研究主题上的偏废是其追求实证科学身份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心理学对实证方法的应用使其不得不放弃对意识的现象性或主观性的研究。因为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意识的现象性是对立的。因此,在科学的视野中,如果仅仅在研究主题上恢复意识经验的地位,而不同时恢复与意识经验相适应的方法,那么现代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就不会得到消除。就像瓦雷拉等人最初所提倡的具身认知进路那样。事实上,具身认知进路除了对早期认知科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之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关于意识经验的新颖看法。具身认知的提倡者们最后慢慢发现,他们在主题上和研究思路上是多么依赖于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的现象学(Manganaro, 2010)。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具身认知观得自于著名的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而且瓦雷拉日后所提出的神经现象学在主题上同样有赖于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现象学,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神经现象学的研究方案来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这一点。

2 神经现象学的研究方案

2.1 以互惠约束应对意识的“困难问题”

1983年,约瑟夫·列文在《太平洋哲学季刊》上发表题为《物理主义与感受性质:解释的鸿沟》一文。文章指出,在大脑的物理结构及功能与意识之间存在一个解释的鸿沟,换言之,对结构和功能的物理说明不足以解释意识(Levine, 1983)。此后,查莫斯在90年代早期提出了所谓“意识的‘困难问题’”。在他看来,对脑的结构和机制进行研究是容易的,而回答脑如何形成关于意识经验的主观性质的问题则是困难的(查莫斯, 2013)。当然所谓意识的“困难问题”实际上是查莫斯从其物理主义的立场看待意识问题时

因感到棘手和困惑而形成的提法。从根本而言,意识的“困难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李莉莉, 2015)。在查莫斯提出这一问题之后不久,瓦雷拉提出了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案——神经现象学。

根据瓦雷拉的设想,神经现象学旨在将来自第一人称视角的(主观体验的、内在洞察的)与来自第三人称视角的(自然科学的、观察的)关于意识的资料结合起来,将意识的“困难问题”“重构为在两种‘不可通约’的现象性领域之间寻求有意义的桥梁(Barbaras, 2002)。在这个意义上,神经现象学通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阐述‘困难’之义而成为对困难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Varela, 1996)。在瓦雷拉看来,关于意识的第一人称视角的研究得自于胡塞尔及其他现象学家,而第三人称视角的研究来自于脑或身体的科学研究,二者的结合能够使“体验结构的现象学解释与它们在认知科学中的对应部分通过互惠约束而相互关联”(Varela, 1996)。对于这种“互惠约束”,汤普森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汤普森说,所谓“互惠约束”,“是指现象学分析有助于引导和塑造科学对意识的研究,而科学发现反过来也有助于引导和塑造现象学研究”(汤普森, 2013)。瓦雷拉对自己的设想践行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将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分析用在意识的神经现象学进路中,提供了一个关于时间意识的神经现象学解释,以此作为“对整个神经现象学事业的一个决定性检验”(Varela, 1999)。

2.2 时间意识的现象学阐释

以胡塞尔的时间意识概念为例,胡塞尔认为存在着一种意识进程的时间,它不同于客观经验世界的有关事物延续性的时间,而是一种内在时间。这种区分在这样一个表达中最为鲜明,即一个被体验到的现在,就其本身而论,不是客观时间的一个点,而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叠加物(胡塞尔, 2009)。这与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观点非常一致。詹姆斯说,“实际被认知的当下并不是一个刀刃,而是一个马鞍,……我们对时间的复合知觉单元是一个持续块,有着一个船头和一个船尾,好像是一个向后看以及一个向前看的端点。我们并不是先感受到一个端点再感受到另一个,然后从对该相继性的知觉中推理出一个二者之间的间隙,而是我们似乎将这个时间间隙感受为一个具有两个端点的整体”(James, 1981)。以一段旋律为例,虽然声音是一个一个响起的,但我们听到或感知到一段旋律,而不是单个的当

下的声音。胡塞尔认为,这不能仅仅用“我有回忆”来说明这个旋律流逝了的部分对我而言是对象性的,也不能仅仅用“我有前瞻的期待”来说明我没有预设这就是所有的声音,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分析。事实上,胡塞尔认为时间意识包含三个机能,即原印象、滞留和前摄。原印象是对“声音—现在”的意识,而在这个声音不断地变化为一个过去,一再有新的“声音—现在”来接替那个过渡到变异之中的声音,不过那个过渡到变异之中的声音并未消失,而是为我们所持有,或者说我们仍在一种“滞留”中拥有它。如果对声音—现在的意识、原印象过渡到滞留中,那么这个滞留本身又是一个现在、一个现时的此在者,它本身是现时的,同时它又是关于曾在的声音的滞留。意识的每个现时的现在都从一个滞留转变为另一个滞留,从不间断,因而形成一个滞留的不断连续,以至于以后的每个点对于以前的点来说都是滞留。声音响起,并且“它”不断地响下去。“声音—现在”变换为“声音—曾在”,印象意识流畅地向一再更新的滞留意识过渡。如果旋律成为过去的,那么我们在此生回忆中就将经历与正在感知时相同的滞留串,以及对尚未出现的声音的期待或前摄。因此,像旋律这样的时间客体只能在这样一种形式中“被感知”,其所包含的时间区别就是在原意识、滞留和前摄行为中被构造起来的(胡塞尔,2009)。

2.3 时间意识的神经动力学验证

对于瓦雷拉而言,神经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将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解释与对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的解释以一种相互启发的方式关联起来。瓦雷拉认为,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结构分析“与我们从物理学中习得的线性时间的点状连续统表征并不一致。但是它们确实与认知神经科学中的一系列结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即认为存在一种与一个认知事件关联的神经事件所需要的最小时间。这种不可压缩的时间框架可以被分析为大脑中与广泛的同步震荡相关联的一种长程神经整合的显现”(Varela,1996)。由此,瓦雷拉提议,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结构可以通过其动力学基础的重构来阐明其性质,换句话说,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结构可以通过动力系统理论的概念得以重新描述,而这些描述可以基于脑的生物特征来进行。事实上,他的这一提议就是要为时间意识结构的现象学解释提供“实证”。

瓦雷拉首先将现象学的时间意识结构转化成神经动力学的描述。他假设:任何认知事件都有一个作

为其涌现和运行基础的单一而特定的神经集合,该神经集合是来自不同脑区域的大尺度整合,具有某种时间编码的特征。例如一个认知活动(知觉的或活动的状态,流过的思想或记忆,或情绪评价等)完成所花费的时间大约是250~500毫秒。其相关的神经过程不仅跨越不同的脑区,而且也跨越了一个时间段,瓦雷拉将这个时间段称为1尺度(1 scale)。而将基本感知运动花费的时间10~100毫秒称为1/10尺度,将记忆描述花费的时间称为10尺度。这个大尺度整合的神经事件的时间编码即相位同步(phase synchrony)。由于认知事件是相继发生的,因此相应的神经事件就会经历大尺度的整合和解耦这样的动态转换,也即相位的动态同步和去同步。瓦雷拉认为,相位的同步和去同步是我们体验为当下认知时刻的神经基础,或者用神经动力学的可操作术语来讲,在1尺度上的整合—放松(integration-relaxation)过程是当下时刻的意识的严格相关物。以此为实验假设,瓦雷拉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个实验研究用以阐释这些观点。

实验以高对比度的黑白面孔的视觉识别作为当下时刻意识的范式例证,向被试呈现正向或颠倒的黑白面孔图。当正向呈现时,被试很容易将其识别为人脸,当颠倒呈现时,通常被试会将其知觉为无意义的黑白形式。被试必须在看第一眼时尽可能快地决定他们知觉到的是不是一张脸。在实验过程中通过记录被试的脑电图(EEG)来获得与有意识知觉相伴的脑区的同步活动。结果显示,在“知觉”条件与“无知觉”条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知觉”到的情况下,能够观察到一个显著的1尺度神经激活的同步化阶段,而在“无知觉”的条件下却没有。在这个同步化阶段之后是一个相位离散的阶段,这表明,神经集合正在经历解耦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按照瓦雷拉的设想,神经现象学进路的研究模式“重又开启了一条人类经验与认知科学和谐共振的道路。……这首先要求对现象学描述的技能进行重新学习和掌握,建立一种持久的现象学考察的传统”(Varela,1996)。这样,从受到现象学训练的被试那里收集第一人称体验的描述报告,然后将这种来自第一人称体验的描述报告作为一种发现与意识关联的生理过程的启发策略。神经现象学的研究规划通过由经验揭示的现象领域和由认知科学所建立的相关现象领域之间的相互约束来寻求接合点。

3 瓦雷拉神经现象学的实质：方法论上的自负情结

从上述神经现象学的研究方案可以看出,神经现象学并非是一种现象学研究,即它并不是采纳现象学的研究传统来做进一步的探究,而仅仅是主张其追随者对现象学进行学习和掌握,以为其神经动力学的描述提供“原料”,然后再采用实验的方法提供相关的神经事实数据。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神经现象学并非是现象学,而是神经科学。事实上,从认知科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神经现象学的研究方式更接近于认知神经科学,因为对神经事件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新的技术,同样需要理论。如果没有理论,任何观测到的数据都是无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神经科学与早期计算表征立场的标准进路相结合的原因。神经现象学将现象学与脑科学相联结是出于同样的动因。即,一方面,它们在主题上依赖现象学,另一方面因为受实证精神的影响,不认同哲学的思辨式研究,因此才会想到采用神经动力学的自然科学路径验证现象学的主题。

就目前来看,神经现象学尚未成为一个系统而成熟的领域(张铁山,2015),其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是严峻的(陈巍,郭本禹,2011)。对于神经现象学来说,一些质疑可能不可避免。第一,目前尚未发现神经现象学的研究在结论上有对现象学的突破(Slagter, Rawling, Francis, Greischar, & Davidson, 2009; Quyen & Petitmengin, 2002),神经现象学研究如果只是对现象学结论的术语转换和神经证实,那么,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是什么?第二,现有的神经现象学研究仅仅对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资料中的少数几个主题做了考察,一个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现象学的所有结论都能在技术上实现对应的神经动力学的同型解释吗?第三,神经现象学的目的在于桥接来自第一人称的现象资料和第三人称的脑科学资料,然而从不同视角对同一事物进行的两种描述有必要桥接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桥接的内在动力要么是对现象学研究方法的不认同,要么是对基于第三人称视角中脑科学研究的绝对自负,甚至兼而有之。最后,正如国内研究者所言,“无论是将现象学还原‘前载’还是‘后载’于神经科学实验,都很难在现象学数据与神经科学数据之间形成真正的、持续的互惠约束”(殷融,201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瓦雷拉等人曾在《具身心

智》一书中坦言,他们对新的心智科学的这种信念受启发于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现象学中的具身性思想。而另一方面,由于瓦雷拉等人所堕于的自然科学背景,在他们看来,实证科学的方法较哲学或现象学的方法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曾雄心壮志地意欲通过具身认知运动发起对传统哲学的革命。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对胡塞尔现象学态度的转变已经表明,他们最初的规划失败了。事实上,现象学与心理科学或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主题和方法之间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自近代以来,对于人类心智就具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手段,一种是人们采用与自然科学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研究途径相一致的脑机制研究,一种是作为能够思想和内省的人确立自身心灵存在时采用的省察途径。从神经现象学对现象学的主题依赖性便可知,这两种研究方案哪一种更具创建性。

从近代以来,在关于心灵的问题上,人们总被自己的两种认识途径所迷惑,而在心—脑问题上陷入平行论,如笛卡尔。平行论引发的最为主要的动机就是,人们总是努力想将两个轨道的讯息对等并共存起来,如所谓的意识的“困难问题”和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而实际上,除了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医学的临床意义和神经生理学对意识的神经机制的探索外,作为心理学家,并不需要了解每一种心理状态或心理现象发生的同时在我们头脑中生理事件的细节。因此,神经科学与现象学的结合,既不是神经科学的必然需要,也不是现象学的必然需要,而仅仅是某些对哲学研究方法不认同,又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盲目崇拜的人所制造的一种思想怪胎。瓦雷拉之所以会从具身认知进路进展到神经现象学,并对现象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Thompson, 2004),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早先在方法论上的盲目自负,同时又缺乏对人的心理或意识本质的深刻理解。今天,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负情结仍然在很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者身上起着作用,它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真正的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障碍。我们必须看到,只有重新恢复哲学的或现象学的方法论地位,重新增补心理学的哲学厚度,才能使我们在对意识的本质理解中获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 查莫斯. (2013). 有意识的心灵——一种基础理论研究 (pp. 340-346). 朱建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巍, 郭本禹. (2011). 神经现象学运动二十年:辨析与厘定.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8(6), 85-90.
- 高申春. (2000). 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从西方心理学历史逻辑透视社会学习理论.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胡塞尔. (2009).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p. 36). 倪梁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莉莉. (2015). 意识困难问题的消解及超越.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5), 70-74.
- 汤普森. (2013). *生命中的心智: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科学* (p. 279). 李恒威等,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殷融. (2016). 重返意识经验世界——评《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心理研究*, 9(4), 94-96.
- 张铁山. (2015). 一个应对意识“难问题”的方法论救治——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思想评析. *哲学分析*, 6(3), 132-140.
- Barbaras, R. (2002). Francisco Varela: A new idea of perception and life.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2), 127-132.
- James, W. (1981).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p.57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 Van Quyen, M., & Petitmengin, C. (2002). Neuronal dynamics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 An example of reciprocal causation before epileptic seizures.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s*, (1), 169-180.
- Levine, J. (1983). Materialism and qualia: The explanatory gap.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3, 354-361.
- Lutz, A., Slagter, H. A., Rawling, B. N., Francis, D. A., Greischar, L. L., & Davidson, R. J. (2009). Mentaltraining enhances stability of attention by reducing cortical nois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9, 13418-13427.
- Manganaro, P. (2010). Phenomenology and neuroscience: Living experience, empathy and embodied simulation. *Comprendre*, 20(1), 153-165.
- Thompson, E. (2004). Life and mind: From autopoiesis to neurophenomenology: A tribute to Francisco Varela.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3(4), 381-398.
- Varela, F. (1996). Neurophenomenology: A methodological remedy for the hard proble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3/4, 340.
- Varela, F. (1999). The specious present: A neurophenomenology of time consciousness (pp.266-314). // Petitot J, Varela F, Pachoud B, Roy J M, eds.,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rela, F., Thompson, E., & Rosch, E.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p.xvii). Cambridge: MIT Press.

The logical dilemma of Varela's neurophenomenology

LI Lili¹, LIU Yunquan²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uqi 830017;

2 Students' Affairs Division,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Neurophenomenology is a research assumption which be proposed by Varela in response to 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It is intended to integrate research data both from neuro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 On the theme, neurophenomenology shows its dependence on phenomenology, while on the method, it esteem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 highly. In fact,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neurophenomenology stems from the tendency to integrate the mind and brain driven by modern parallelism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from the blind conceit of na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The conceit complex in method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stacle in psychology and even in cognitive science research. Only by restoring the philosophical or phenomenological status of methodology and reinforcing the philosophical thickness of psychology can the study of mind and consciousness be further promoted.

Key words neurophenomenology; Varela;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parallelism